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主办

南方语言学

第一辑

主编 甘于恩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主办

南方语言学

第一辑

主编 甘于恩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语言学. 第1辑/甘于恩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35-492-8

I. ①南… II. ①甘…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55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57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挂在嘴边，引以为豪，却常常忽略了还有一个“语言丰富”的现实同样也值得炫耀，值得自豪。语言是资源，这一点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同。语言资源的丰富，一方面表现在我国五十多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行汉语的广大地区，从南到北存在着形形色色有别于全社会通用汉语的地方方言。各种民族语言和种各汉语方言，各有各的特色。这些各自不同的特色，构成了多彩多姿的中国语言面貌。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承传下来，传播开去的。毫无疑义，语言和方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事。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必然会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应用、对语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寄予极大的期望。

相对而言，我国南方语言资源要比北方丰富得多。西南地区聚居着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那里可以听到各种与众不同的民族语言；而东南地区，则是汉语方言种类最为繁多、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汉语七大方言，除了广义的北方方言大都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外，其余六大方言，包括闽、粤、吴、客家、湘、赣等方言，都分布在长江以南，特别是东南各省之中。因此，研究我国各种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学者，自然都把目光投向我国南方地区，东南各省历来都是语言学家辈出之地，这跟语言资源特别丰富和语言研究土壤特别肥沃不无关系。近三十年来，紧随着我国学术振兴的步伐，南方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一直牵动着众多语言学者的心，“把语言和方言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的呼声经常在语言专业人士的脑海中回荡。反映到我们身边这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汇集到暨南大学来的汉语方言研究“发烧友”身上，就是立定脚跟，看准方向，以摸清广东方言“家底”，揭示广东方言面貌为己任，一次又一次地走出校园，奔向方言遍布的沃野，认真开展广东地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方言的调查研究，陆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广东语言研究的一块亮丽品牌。从80年代中开始，暨南大学以先后获得方言学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为契机，以建立方言研究机构为依托，以屡屡被定为广东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为动力，着力开展粤、港、澳三地粤语研究同道间的协作，形成了足以应对广东复杂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团队，先从珠江三角洲的方言调查起步，渐次由近及远地向两翼延伸，对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的粤语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一批大型的方言专著。其中包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和《广东粤方言概要》等，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他们认为通过近二十年来暨南大学方言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使得广东方言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摆脱了以往广东方言情况复杂而方言研究成果不多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暨南大学方言研究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展。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方言研究为方言应用服务方面有了明显的表现，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2000）”，出版了由粤港澳三地粤语专家协力编纂的、服务于广大粤语应用者的《广州话正音字典》。

二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型汉语方言及方言学词典编纂工作在暨南大学挂牌启动，由暨

南大学方言学者詹伯慧教授出任主编。

三是暨南大学方言工作者把触觉向外延伸到了广西南部,对桂南粤语及客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查,出版了几部研究广西南部汉语方言的专著。顺着这一向外拓展的思路,还进一步把汉语方言的研究扩展到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上,对同一汉语方言在海内外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形成差异的原因及形成差异的历程。陈晓锦教授近几年发表了许多有关海外汉语方言的论文,还出版了专著。围绕这一课题,她几乎走遍了东南亚所有华人聚居的国家,实地调查了当地华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为了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发展,2008年还在暨南大学举行了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近十年来暨南大学承担了好几项国家社科及广东省社科方言方面的重点研究课题,都完成得比较好。围绕这些课题,方言研究中心的学者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对广东省内各种方言进行了布点较为密集的田野调查,特别是针对人们知之甚少的方言,大大弥补了此前对广东部分地区方言面貌了解不足的缺陷。例如丘学强博士针对濒危方言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军话研究》,出版后备受海内外学者的瞩目,获“李方桂中国语言学论著优秀奖”;又如近期由甘于恩教授领头完成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汉语方言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显示出以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为主力的语言研究队伍是充满活力的,是不断有所开拓、有所进取的。

正是在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方言研究氛围中,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于2008年5月获批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个专门研究汉语方言的省级重点科研基地。基地的建立为汉语方言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大鼓舞了汉语方言研究团队的士气。大家个个摩拳擦掌,都想在基地中大显身手,多作贡献。在研究基地建设的规划时,创办一份可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学术刊物,自然也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了。个人认为,要使一个学科能够飞跃发展,离不开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要有一个能够统筹学术队伍,把分散的力量聚集到一块儿,使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的学术机构;二是要有一份可以发表学术成果、沟通学术信息、切磋学术问题、交流学术心得的专业刊物。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学科,既然有了方言研究中心,又建设起方言研究基地,这机构的问题算是得到解决了。接下来的当务之急也就是如何创办一份学术刊物,如何开辟一个学术园地的问题了。此刻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份《南方语言学》,就是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才让它面世的。有了一个好的机构,又有了一份大家乐于阅读、乐于供稿的刊物,暨南大学的方言“发烧友”们也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对于刊物的名称,有人也许会问:“干吗不干脆叫《南方方言学》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这是广东省唯一一份语言科学刊物,尽管是由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方言研究基地)主办的,还是应该同时面向广东众多的非研究方言的语言学者,使它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和作者。广东既是一个多方言的地区,也是一个拥有不少语言学者的地区。办好这份《南方语言学》刊物,一定要敞开大门,广纳群言,把各方面的语言科学论文都吸收进来,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刊物里很好地展开学术讨论,贯彻百家争鸣,达到以文会友、切磋交流的目的。

好了,就让我啰唆就此打住吧!研究基地是新的,研究刊物也是新的。我就以一个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退伍老兵的身份,在此祝贺年轻的同道在新的起跑线上加倍努力,勇往直前,把南方独具特色的语言和方言一一研究好、应用好。我们要支持这个刊物,爱护这个刊物,使之能越办越好,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多作贡献。

詹伯慧

2010年2月3日于广州暨南园

目 录

序	詹伯慧 (1)
---------	---------

方言理论探索与建构

略论香港的“社区词”——兼评《香港社区词词典》	詹伯慧 (1)
论粤客方言言语鉴别问题 (之二) ——语法鉴别	饶秉才 (5)
濒危方言漫议	李如龙 (12)
福建漳平 (永福) 方言的一种比较句——一次难忘的方言语法调查经历	张振兴 (18)

两广汉语方言研究

五权语言生活——一个语言替换的实例	麦 耘 (21)
“厕”字粤读研究	单周尧 萧敬伟 (31)
入声唯闭韵尾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化——香港粤语个案研究	朱晓农 严至诚 (34)
粤语语音特点的讨论	伍 巍 (45)
东南方言的三种演变模型：裂变、触变与同变——以广西方言为例	李连进 (52)
19 世纪以来潮汕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	庄初升 陈晓丹 (58)
河源惠州“本地话”语音特点概略 (一)	严修鸿 (65)
揭西灰寨客家话特点记略	丘学强 (79)
韶关土话的词汇借用	李冬香 (85)
粤语平话等方言上声的分化类型	王莉宁 (91)
广西平乐闽语的几项韵母特征	张燕芬 (101)

方言语法研究

广州话动态助词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彭小川 (105)
简论普通话与粤语的蒙受句	邓思颖 (110)
赣方言 (宜丰话) 疑问范畴研究	邵 宜 (116)
桃源话的动态助词	张 军 (127)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广东怀集永固标话音系及其主要特点	林伦伦 (143)
------------------------	-----------

岭南语言资源与语言技术

- 田野之声有声语料采集软件的研制 范俊军 邹志超 (152)
广东粤方言语音数据库的田野调查及思考 邵慧君 曾 珊 (157)
基于语义网格模式的岭南方言资源库建设 熊玉珍 彭志峰 (161)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 泰语中的潮汕方言词汇试析 张双庆 潘家懿 (164)
缅甸仰光台山话百年间的若干变化 陈晓锦 (171)

语言文字应用

- 汉语国际推广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班 昭 (179)
广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研报告之一: 成效与经验 刘新中 (183)

媒体语言研究

- 说“被××” 甘于恩 (191)

地理语言学

- 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符号应用研究 秦绿叶 甘于恩 (200)

方言与音韵

- 从《广东省土话字汇》看二百年前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分合类型 万 波 甄沃奇 (206)
古入声在株洲中心城区话的音韵层次 钟 奇 (216)
古日母字读为 [dz] 情况考察 孙玉卿 (225)

方言与移民

- 从中山闽方言岛看闽语在广东珠三角的流播 陈小枫 (230)

方言与文学

- 略论明刊戏文《荔镜记》的方言归属 王建设 (240)

语法研究

- “想死我了”及其相关句式 陈曼君 (245)
- 现代汉语动量词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前瞻 周 娟 (256)

词汇学与辞典学

- 六种词汇学理念在近现代早期语文词典中的实践 刘晓梅 (262)

博士论文撮要

- 论徽州方音 伍 巍 (268)
- 潮州话否定词研究 张晓山 (269)
- 论赣方言的音韵特征 邵 宜 (270)
- 吴语、粤语的小称变音与“儿”尾 邵慧君 (271)

研究机构

-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曾建生 (272)

书刊介绍

- 粤语研究 建生、翠兰 (274)
- 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语言学杰出学生论文奖征稿通知 粤语学 (275)
- 稿 约 《南方语言学》编辑部 (276)
- 稿 例 《南方语言学》编辑部 (277)

略论香港的“社区词” ——兼评《香港社区词词典》

詹伯慧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2)

提要 本文论述汉语词汇中一个新的概念——社区词。社区词是反映不同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殊词语。在方言地区，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交织在一起，构成方言中有别于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的词语。但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是可以有区别的。香港粤方言中既有大量的一般粤方言词，也有不少属于香港地区特有的香港社区词。文章剖析了香港社区词的方方面面，并评介了第一部记录香港社区词的词典，笔者认为这是一部阐发一种词汇新理念的词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键词 香港 粤语 方言词 社区词

香港是个语文应用多元化的现代化社会，日常使用的语言种类繁多，除了作为主流交际语“三语两文”中的粤语（香港人习惯叫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外，人们在市井中还常常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方音：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闽南话的，有说客家话的，有说上海话的，有说海南话的……此外，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还居住着数以万计的非华裔族群，他们也各自说着自己的母语，如印度语、巴基斯坦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印尼语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人数最多、社会通行率最高的粤语中，存在着许多令人瞩目的语言现象，跟其他地方（如广东、广西）的粤语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词汇方面，由于香港社会历史背景特殊，而当今社会发展又特别迅速，新词新语不断涌现，更使得香港粤语常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其中尤为突出的要算所谓“社区词”的层出不穷了。

说起“社区词”，人们首先会想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方言词”来。通常我们把只在某个方言中通行的、有别于民族共同语的词语视为方言词。这其实是“狭义”的方言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即使跟其他方言相同、跟民族共同语毫无差别的词（语），只要出现在这个方言的词库中，就该算是这个方言的词语，自然可以编入这个方言的词典中。李荣先生主编的42卷《现代汉语方言词典》，每一卷所收词条都有七八千，就是兼收与众不同的词（语）和并非独有的共同语词，是广义的“方言词典”。粤方言是通行地域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在它那丰富多彩的词汇中，包含着各式各样本方言特有的方言词语。一些专门汇集这类属于粤方言特有词语的辞书，收词的数目少的有三四千个，多的达到五六千个甚至七八千个。就拿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冠以“香港”字眼的粤语词典来看，收词较多的是郑定欧主编的《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有大约8000条；收词较少的是吴开斌于90年代初出版的《香港话词典》，有4000条（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而最具香港特色的《港式广州话词典》（张励妍、倪列怀编著，万里书店，1997）收录的粤方言词语则有7000多个，编者还特别说明其中香港地区独有的粤语词约2000个。这些粤语词典，除上述几本以外，其他几部有影响的粤语词典，如早期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20世纪末白宛如的《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麦耘、谭步云的《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等，所收词（语）到底是不是都属于与众不同的方言词，也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狭义方言词”呢？这些方言词是什么样的内容？又是怎样产生的？这类疑问难免会在读者脑子里盘旋。面对这一现实，解答这类质疑成了粤语研究者和粤语使用者常常议论的话题，“社区词”的概念正是近十多年来在关于方言词的纷纷议论中被提出来的。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一种紧扣现代社会脉搏、与现代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语言现象。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汉语词汇结构的格局,给汉语词汇的研究和应用注入了新的内容。认同“社区词”的学者,把“社区词”和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等同列为语言词汇总构架中的组成部分。“社区词”的出现正是词汇紧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具体体现。没有“社区”这一新型社会组合体的普遍存在,自然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反映不同社区生活的特殊词语产生。而这些植根于不同社区的居民生活中,反映不同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词语,显然跟一般植根于方言地区、反映地域性特征的方言词语是不完全等同的。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中,既会有方言词出现,也会有“社区词”出现。一方面,出现在方言地区的社区词可以同方言词一起作为方言中的特有词语,社区词跟方言词交织在一块儿,往往难分彼此。一般收录地方方言的方言词典,包括前面举出的那些影响较大的粤方言词典,都把可以归入“社区词”的词语一股脑儿认作方言词汇集到一块儿来。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因为即使“社区词”这一新概念在语言学界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大家对此已有共识,也并不意味着“社区词”概念的出现必然造成方言词概念的缩小,形成“社区词非从方言词剥离出来不可”的后果。承认并支持“社区词”的人,仍然可能认为在方言的词汇架构中,方言词是一个大的组成成分,而社区词只属于方言词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或认为“社区词”根本就和方言词合二为一,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举例来说,当今香港粤语中一些常用的词语,如反映香港特区居民中特殊人群的“菲佣”、“印佣”等词,甚至于曾经流行一时的“太空人”和此前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船民”这样的词,应该称得上是香港地区的“社区词”,但在粤语地区以外的人看来,它们又何尝不是香港粤语方言词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区词”既然与方言词不能等同,也就不一定只出现在某一个方言中,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也有可能被作为新词新语吸收到民族共同语中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新词新语产生。在这些进入“社会通用语”——普通话的新成员中,有不少是原属于某方言区的“社区词”。因此,从词汇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角度看,方言地区的“社区词”往往跟方言词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可被吸收到“社会通用语”中来。只要通行在方言地区的某些“社区词”所反映的特定事物已突破该方言区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出现,该方言的“社区词”就有可能进入“社会通用语”。从“社会通用语”(普通话)词汇构成与发展的角度看,从方言里吸收过来的新词新语,一般总是笼统地视作“来自方言”,并不去细究哪些是方言中的“社区词”了。因此,我们认为,方言词与“社区词”的区分,只是在剖析方言地区特有词汇、考虑方言词汇的架构时才发挥作用;进入“社会通用语”这个层面,人们在认识词汇的架构时,往往会比较注意所出现的新词新语有哪些来自方言地区,至于已被确认来自方言地区的新词新语是否该看作“社区词”,那就让研究方言词汇的学者去斟酌了。当某些原先只在一定地域内出现的“社区词”已进入“社会通用语”(普通话),并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时,这个“社区词”自然已被确认为“社会通用语”中的新词新语,甚或有可能进一步被吸收到不断跟进词汇发展的权威辞书《现代汉语词典》中来,而不再仅仅是某方言区独用的“社区词”了。对新词新语进行分析整理,并探讨其规范问题,那是研究“社会通用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课题,已经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方言词与“社区词”的问题了。因此,我们还是认为,在方言词汇的研究中,对其中的一般方言词和特殊的“社区词”进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研究取得成果,能够明确一般方言词和方言“社区词”的差别,并有把握指明哪些词(语)是“社区词”的前提下,编纂一部某方言的《社区词词典》,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放到比方言区更大的范围内——从整个汉语词汇系统来考虑时,在汉语“社会通用语”的层面上,方言区的“社区词”跟一般方言词自然就会被一概作为方言词来看待,不存在混不混淆的问题。例如,在香港的特有词语中,有一大批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语词,如楼盘、楼花、楼面、楼龄、楼市、楼契、供楼、交楼、烂尾楼、二手楼等,这些在香港语言词汇中被视为“社区词”的,当其中某些词随着内地房地产业的兴起而被吸收到“社会通用语”中来时,从“社会通用语”新词新语的来源上说,很可能就会视作源自香港的粤方言词。也有比较特别的情况,拿新加坡来说,有着来自中国内地各地的华人,他们说着各种汉语方言,代代相传。可是,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在华人中推行等同于中国普通话的“华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新加坡华语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新加坡社会的华语词汇,并不属于新加坡某一汉语方言所专有的方言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华

语中也都没有出现，这类词语就不能说是新加坡某种华语方言的“社区词”，而只能说是整个新加坡华族通用语——“华语”的“社区词”了。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到处可见“组屋”，它相当于香港的“公屋”；还有新加坡到处可见“巴刹”，它相当于香港的“街市”；新加坡华人称出租汽车为“德士”，它相当于香港的“的士”，如此等等，我们不妨把这类新加坡华语的词（语）看作是与不同的新加坡华语的“社区词”。这种“社区词”体现了新加坡华语（相当于我们的普通话）的特色，它不属于新加坡各种华人方言，因此就不会像香港那样“社区词”跟方言词交织在一起，混淆难分。此前受聘于新加坡联合报业集团的汪惠迪先生曾经编纂过新加坡华语词典，该词典就录入不少属于新加坡华人社区使用的新加坡华语“社区词”。让我们回过头再来面对香港的现实状况吧！既然香港大量的方言词和社区词经常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来，我看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在两者之间划上一条鸿沟不可。同一个词既可视作方言词也可视为“社区词”，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切入来认识：从不同的地域性来看，某词可认为是方言词；但从不同的社会性来看，这同一个词又可能被认为是“社区词”。例如通用汉语中有“住宅小区”（或称“居民小区”）这种叫法，在香港则有“屋村”一词，从不同地域方言的角度来看，“屋村”相当于内地城镇中居民居住的“小区”，可说是香港的粤语方言词；但是，从特殊的社会背景来考察香港出现的“屋村”一词，它又应该可以算是“社区词”了。与“屋村”相似的还有“公屋”、“居屋”、“私人楼宇”等系列词语。可以说，典型的方言词反映语词的地域性特征，典型的“社区词”反映语词的社会性特征。在词汇比较丰富的方言中，往往并存着一些典型的方言词和“社区词”，共同构成独特的方言词汇体系，因此，对一个方言的词汇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必要同时关注该方言词汇中的方言词和“社区词”。只有两者兼顾，弄清两者的特性和关系，才能把该方言的词汇特征较全面地展示出来。就香港这个语言情况复杂的粤方言通行地区来说，在审视其与众不同的语言现象时，引入“社区词”这样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我看是有必要的。

据我所知，较早提出“社区词”概念并加以理论阐述的是香港学者田小琳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她就从香港的语言实际出发，认真考察、剖析社会上形形色色与众不同的词语时，发现其中源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不同和使用语言者社会背景、心理感受的差异而形成的一些流通于一定社区人群中的语词，有别于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能接触到的方言词，她感到这部分词语不宜笼统地说是香港方言词，有必要另立一类。经过反复思考和琢磨，她在1993年就正式提出了“社区词”这一崭新的概念，并且着手广泛收集、整理她心目中的香港“社区词”，开始对香港“社区词”作深入的研究。此后，田教授接连写了多篇关于“社区词”的论文，阐述其观点和理据，颇受语言学界的瞩目。在此基础上，她潜心编纂《香港社区词词典》。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部反映香港“社区词”面貌、收词约2 000条的词典如今终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了。如前所述，我对她提出的“社区词”的概念是颇为赞赏的，但始终还是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对于在粤方言词汇中哪些可以算是“社区词”，哪些仍然只能算是方言词，心中也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今有了这部词典，总算有了一个依据，遇到举棋不定的时候，翻一翻田教授这部词典，把握也就大多了。我们应该感谢田教授，她为香港粤语词汇的研究和应用做了一件有突破性意义的好事。在这部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社区词”，这些“社区词”都是生活在香港这个“大社区”中的民众十分熟悉的，但对于同属粤方言区的珠江三角洲民众来说，却不免感到生疏，这正好说明“社区词”不完全等同于方言词。例如：看更（大厦或公共场所的护卫员）、街市（政府兴建、管理、出租的有固定摊位供小商贩摆卖的市场）、唐楼（没有电梯的旧式楼房，一般不超过六七层，多建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居屋（政府根据“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后出售给符合一定条件居民的住宅）、强积金（政府为了让雇员老有所养而强制性要求雇主和雇员按雇员工资比例缴纳的资金，类似内地的“公积金”）、车长（香港地区巴士司机的称呼）、长俸（公务员享有的退休金，退休时一次性发给的一笔款项。领取长俸后还可逐月获取按原工资一定比例发给的工资福利）、太平绅士（香港政府给那些对社会贡献良多的人授予的奖励性头衔，实际上就是“香港政府治安委员会委员”）、特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还有一些香港特区特有事物的名称，如惩教处、百万行、草根阶层、勾地、生果金、综援、徙置区、沙展、社工、楼花……这许许多多的“社区词”，离开了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就不容易听到了。这些“社区词”是词典的编者花

了大量的心血，根据20年来香港中文报刊上的语料遴选出来，又再通过计算机网络核查了所录词语在六十多种报刊上出现的频率，才最后确定下来的。编者这种孜孜求索的精神，实在值得赞赏。“社区词”毕竟是词汇学、方言学中的新事物，相关的问题还需继续研究探讨，有时也难免令词典的编者举棋难定，甚或偶有差错、出现纰漏，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词典中收进一些通用于整个粤语区的一般方言词：拍拖、老公、巴士、的士之类，把它们称为“社区词”，有没有必要？又如一些在通用汉语中经常用到，已不属于某个方言中特有的词语，也作为香港“社区词”收进来了，如纳税人、私有化、速递公司、欠薪等，我看这也是值得斟酌的。我对“社区词”的基本态度是：既赞成在方言词汇的研究、剖析中引入“社区词”的说法，但同时也认同把方言地区的“社区词”看作同属方言总词库中与众不同、在显示方言特征中发挥作用的词语，而不把它看成是和方言词截然不同、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一类词语。《香港社区词词典》旨在建立“社区词”的概念，着重反映“社区词”有别于方言词的一面，这是很有新意的。由于“社区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它和方言词之间实际上存在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因而在《香港社区词词典》中反映出对某些词语的收录举棋难定的状况，以至于出现个别判断欠妥、有待商榷的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瑕不掩瑜，这毕竟是一部为阐发一个新理念而编纂的词典，在香港粤语词汇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我认为它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辞书，我也相信它一定会引发语言学界对“社区词”的重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论粤客方言言语鉴别问题（之二）*

——语法鉴别

饶秉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米尔皮塔斯市）

提要 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利用语音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和词义，构词体、构形法、词的组合、数字法、各类词的语法特点，状语、补语、双宾语的不同位置以及比较句、被动句、处置句、“来”“去”句、疑问句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上。

关键词 粤客方言 言语鉴别 构词法 词的组合

3 语法鉴别

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利用语音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和词义，构词体、构形法、词的组合、数字法、各类词的语法特点，状语、补语、双宾语的不同位置以及比较句、被动句、处置句、“来”“去”句、疑问句等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上。鉴别特定语料时，可以根据语料中反映出来的方言语法特征来鉴别语料制作人操何种方言（次方言、土语）、属何地区人。

3.1 从各方言的构形法和构词法的特点来鉴别

3.1.1 根据各方言利用语音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或词义的特点来鉴别

各方言利用声调或音素变化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或词义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广州话可以通过声调变化来表示动词“体”的语法范畴（见 3.5.1）。梅县客家话的指示代词可以通过声调变化来表示近指和远指，如“𠬞 [kɛ²¹] 兜”（这些）和“𠬞 [kɛ⁵²] 兜”（那些）。广州话有些单音形容词可以通过变调和变调加重叠来表示大小、长短程度的不同，例如，“长”原调属阳平调，念原调，表示一般长；如变读高升变调，是“这么长而已”的意思；变读高平变调，则变为“这么短”的意思；变读高平变调并重叠，则变为“这么短短”的意思。有些单音形容词可以用重叠加变调或重叠、变调加结构助词“㗎”来表示程度的深浅，例如，“靚”（漂亮、质量好）原调属阴去调，在“靚衫”中读原调，表示一般漂亮；如重叠为“靚靚”后，第一个音节变读高升变调，则表示“很漂亮”；重叠后，后一音节变读高升变调，再加上一个助词“㗎”，成为“靚靚㗎”，则表示“略有漂亮”，程度浅了。另外，有些单音形容词还可以利用变调和元音变化，或变调加元音变化并重叠来表示多少的，例如，“多”念原调（阴平）表示“这么多”；如果把“多”改变元音和变调读高平调（即变为 [tɕ⁵⁵⁻⁵³]），则表示“这么少”；如果“多”改变元音，变读高平变调并重叠，则表示“这么一点点”。像以上这样利用语音变化来表示不同语法意义或词义的现象在各方言中不胜枚举。

3.1.2 根据各方言词重叠形式上的特点来鉴别

普通话和各方言的名词、形容词、动词、量词都有不同的重叠形式，重叠后所表示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鉴别特定语料时，可以根据特定语料中表现出来的不同重叠形式和它们所表示的不同意义来鉴别制作者的方言属性。

*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粤客方言言语鉴别问题（之一）——语音、词汇鉴别”刊登于《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汉语方言名词重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的普通名词重叠可以表示逐指,如“人人”即每一人,“家家”即每一家。西安话某些普通名词可以通过重叠的方式来表示新的词汇意义,如“水”这个名词,重叠成“水水”,即变成“醋”的意思。成都话可以通过普通名词的重叠方式来表示小称或爱称,如“瓶瓶”即“瓶儿”的意思。兰州话也可以用重叠名词的方式来表示小称,如“虫虫子”即小虫的意思。北方方言一般用重叠名词的方式来作亲属称呼,如“妈妈”、“哥哥”等;而客家方言则不用重叠名词的方式来作亲属称呼,而是用加前缀“阿”的方式来作亲属称呼,如“阿哥”、“阿婆”等。

除单音名词可以重叠外,各方言中还有多音名词的重叠方式,如广州话的“鼻哥勾勾”、“胡须白白”、“手指督督”、“口水喷喷”等。汉语方言形容词的重叠方式和重叠后所起的作用是五花八门的。各个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比普通话更丰富多彩。有些重叠形式虽然相同,但所起的作用和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广州话形容词的“AA”式,除形容词重叠外,还要变调。如果重叠后的第一个音节变读高升变调,就起深化形容程度的作用,如“薄薄”[pɔk²²⁻³⁵pɔ²²] (很薄);如果重叠后的第二个音节变读高升变调,并后加结构助词“咁”,则反而削弱了原有的程度,如“薄薄咁”[pɔk²²pɔk²²⁻³⁵tei²²⁻³⁵] (微薄;比较薄)。这两种重叠式均可充当谓语。这些都是跟普通话或其他方言有所不同的。粤方言阳江话“白白白”即“很白很白”的意思,表示程度到了极点。这种三叠式形容词在句中经常充当谓语和补语。福建长汀客家话有四叠式形容词,表示程度加深,如“头发蓁蓁蓁蓁”(头发乱蓬)。闽南方言厦门话有五叠形容词,如“紧紧”[kin⁵³⁻⁵⁵kin⁵³] (较快)、“紧紧紧”[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 (极快极快)、“紧紧紧紧紧”[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kin⁵³⁻⁵⁵] (快得不得了)。这种形式有强调或特别强调事物的性质状态达到极端的作用。广州话的“A××”式,重叠部分起强调、修饰作用,表示程度加深,如“多罗罗”、“肥腩腩”、“懵盛盛”等。一个形容词如果带上不同的重叠衬字,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感情色彩,如“白雪雪”(白得可爱)、“白晒晒”(白得难看)、“白蒙蒙”(粉白)等。兴宁客家话的“A××”式后面还要加一个助词“里”[li⁴⁴],起强调性状的作用,如“酸丢丢里”,即“酸酸的”、“凉浸浸里”,即“凉快”或“略带寒意”。

在动词重叠方面,广州话有一种结构比较特殊的“AA×”式,前面是动词重叠,后面带一个衬字或逐步虚化的实词语素。例如“搞搞震”、“嘟嘟贡”。这类词的主要意思在前面重叠的动词,后面部分起衬托作用。大埔客家话的“BBA”式一般表示动作活动的持续状态,用来模拟或描绘动作活动的具体情况或状态。例如“□□[nuŋ²¹nuŋ²¹]行”(不停地爬行)、“□□[tam⁴⁴tam⁴⁴]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pat⁵pat⁵]跌”(不断地落下来)。广州话的助动词重叠后变调,并加上助词“咁”,可表示弱化动作程度,如“会会[wui¹³wui¹³]咁”(有一点儿会)。

除了从名词、形容词、动词和助动词重叠的特征来鉴别外,还可以从量词重叠的特征来鉴别。例如温州话的“A加A”式,表示逐指的意思(“回加回”,即每一回);安徽当涂话的“AAA”三叠式,表示“每一”的意思(“年年年”,即“每一年”)。

3.1.3 根据附加成分的特点来鉴别

各方言的附加成分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词附加成分的形式尽管相同,但它的结合能力、意义和用法则不一样。北方方言多数用“儿”和“子”,只作前一音节的韵尾而不能独立成音节。“儿”可作名词的标志,含“小”义和爱称。广州话有少数量词带“儿”,但不能作前一音节的韵尾,只能单独成音节,不带“小”和爱称,而且要变读高平变调,如“猫儿”、“乞儿”(乞丐)。西安话单音名词重叠后儿化可变作形容词,如“土土儿”(有点儿土气)。可见,同是“儿”作词尾,在各方言中的结合能力、意义和作用各不相同,这是鉴别言语的方法之一。普通话的词尾“子”作名词标志并念轻声,在一定场合下含贬义,但广州话的“子”尾的词在普通话均不加“子”尾,如“番豆子”(花生)、“称子”、“歌子”、“黄葛子”(葛薯、豆薯)。不用或少用“儿”或“子”尾的方言,则另有其他词尾,如广州话的“仔(靚仔)、佬(憨佬)、婆(衰婆)、女(乖女)、鸡(滞鸡)、斗(吼斗)、包(女包)、哥(鼻哥)、头(膝头)、公(鸡公)、𩺰(鸡𩺰)”等。这些词尾一律单独成音节,不念轻声,作名词标

志,有些可作性别标志;有些带词尾后含贬义或轻蔑之意。梅县客家话常用的词尾有“欸”[ɛ、le、ne、ke]^①、“头”、“公”、“嫲”、“牯”,如“歌欸”、“膝头”、“耳公”、“鸭公”、“猪嫲”、“狗牯”。这些词尾不单独成音节,不轻读,作名词标志,其中“公”、“嫲”、“牯”还可作性别的标志。鉴别特定语料时,对于词形相同而词义和用法不同的词尾应仔细分析,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表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多数的词尾,北方方言多数用“们”来表示;但有些方言可把“们”加在其他名词后表多数,如河北藁城话的“衣服们”、兰州话的“肉们”。广州话的“咁”、客家话的“兜”,相当于普通话的“们”,但它们只能作人称代词的复数,不能作指人名词的复数。

3.2 从各方言词语结合的不同特点来鉴别

汉语方言词与词的结合各具特点,从现有的材料看,主要表现在称数法、量词和名词的结合,名量和动量的搭配关系,形容词的特殊结合能力及“数—量—动”结构的不同上。鉴别特定语料时,可以根据各方言中词语结合的不同特点并联系语料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方面的特点来鉴别。例如“万五银”(一万五千元)、“四千五斤”(四千五百斤)、“百八蚊”(一百八十元)、“毫二”(一角二分)等说法,肯定不是普通话,而是广州话。因为普通话中只有多位数的末位数前不是用零时,才能使用省略法,如“二千五”(二千五百)。如果后附量词时,一般就不能省略,如“三万五千斤”不能说成“三万五斤”;但广州话、客家话、厦门话不管带不带量词,末位数一律可以省略,如“四千五百斤”可以说成“四千五斤”、“一百八十元”可以说成“百八元”、“一角二分”可以说成“一角二”或“毫二”,连前面的“一”也可以省去,而普通话以“一”为首的数字,只有在十位数前,“一”才能省去。既然广州话、客家话和厦门话都有同样情况,为什么又肯定它不是客家话和厦门话呢?因为客家话和厦门话都不用“蚊”(元)或“银”作量词。

从名词和量词结合的不同特点来鉴别。例如“件衫点解咁长架?”(这件衣服怎么那么长的)和“只鸟歇在树顶”(一只鸟儿歇在树上)这两句话,从它们显示出来词语和句子结构的特点来分析,可以肯定它不属于北方方言,而第一句话属粤方言、第二句话属闽南方言潮州话。其根据是:①北方方言的量词一般不能直接与名词结合,中间必须有一个数词或指示代词组成“指代—量—名”或“数—量—名”这样的结构(“这件衣服”、“一只鸟”);但是,粤、闽、吴方言的量词可以直接和名词结合,而不用指示代词或数词。以上这两句符合这一特点。②北方方言不可能有“点解”、“架”这几个词,只有粤方言才有这样的词。闽、吴方言的量词虽然也可以直接和名词结合,但它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词。③北方方言和客家方言都不会把“树上”说成“树顶”,粤方言虽然可以这样说,但不能使用“鸟”这个词和“歇在树顶”这种说法。

从名词或动词与量词搭配的不同特点来鉴别:各个方言间量词有同有异,相同的量词与名词或动词的搭配关系也不大一样。例如普通话和各个方言中都有“只”这个量词,但一般只用来作禽兽或器皿的量词,不能作人的量词,而客家话可以称“一只人”(一个人)。“粒”在普通话和多数方言都有,一般用来称较小的东西,如“米”、“种子”、“药丸”等。但是,厦门话的“粒”可作鸡蛋的量词(如“一粒蛋”),“只”可作飞机的量词(如“一只飞机”)。“车”的量词一般都用“辆”或“架”、“部”,但昆明话则用“张”、南昌话用“只”,厦门话用“顶”。“歌”的量词普通话用“首”或“支”,而客家话可用“条”。“桥”的量词普通话和多数方言用“座”,但广州话用“度”、苏州话用“顶”、厦门话用“践”、西安话用“个”。

除了名词、动词能跟量词结合外,客家、吴、闽南方言有些形容词也可以跟量词构成“形—量”或“形—量—名”结构,如“小张”、“大张”、“细只”、“大只”等。根据特定语料中反映出来的词语结合特点来鉴别语料制作人操何种方言、属哪一地区人是很起作用的。

① “欸”受前一音节韵尾的影响而变音。

3.3 从方言语序上的差异来鉴别

普通话和各个方言的语序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粤、客、闽、吴方言和皖南徽州话的状语、补语、双宾语在句中的位置与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异。

3.3.1 根据状语的不同位置和充当这种状语的不同词语来鉴别

普通话表示数量的状语通常位于谓语之前,但广州话和客家话表示数量的状语既可位于谓语之后,也可以位于谓语之前(口语中常位于谓语之后)。例如广州话“睇多几次”(多看几次)、“买少一件”(少买一件);客家话“看多几次”(多看几次)、“拿少一只”(少拿一个)。

普通话表示频率、范围的状语通常位于谓语之前,但广州话和客家话都有三种形式,如“买一本书添”、“再买一本书添”、“再买一本书”(再买一本书)。其中第一种形式最常用。

普通话表示程度的状语通常位于谓语之前,广州话则可前可后,如“呢碟餸咸得滞”、“呢碟餸太咸”(这一盘菜太咸)。广州话能作后置状语的程度副词是有限的,常见的除“得滞”外,还有“过头”、“过龙”、“乜滞”、“到死”、“到极”等。客家话、潮州话表示程度的状语也有后置现象,前者如“热过头”、“热到死”(太热了),后者如“只幅画雅死”(这幅画很漂亮)。

普通话表示时间的状语通常位于谓语之前,但广州话经常位于谓语之后,如“你行先(你先走)”、“唔好扯住”(先别走)等。

3.3.2 根据补语的不同位置和充当这种补语的不同词语来鉴别

普通话表示可能与否的补语通常位于宾语之前,但有些汉语方言的补语必须后置,有些方言既可前置亦可后置,而且充当这种补语的词语和句式也各不相同。例如广州话的这类补语,既可位于宾语之前,亦可位于宾语之后(常用式)。如“你斗佢唔过”、“你斗唔过佢”(你斗不过他)。客家话这类补语则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位于宾语之前,如“佢打唔过佢”(我打不过他);第二种是位于宾语之后(常用式),如“佢打佢唔过”(我打不过他);第三种也是补语后置,但形式与第二种不太相同,如“学得佢多东西到”(学得到那么多东西)。潮州话的这类补语则后置,如“伊咁我不过”(他说不过我)。

3.3.3 根据双宾语的不同位置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来鉴别

普通话双宾语的位置通常是在动词后面,指人宾语在前,指物宾语在后。而广州话的指人宾语和指物宾语都可前可后,主要取决于动词性质或语言习惯,例如“畀张报纸我”(给我一张报纸)中的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但“你攞佢五蚊”(你拿他五元)不能说成“你攞五蚊佢”,指人宾语只能在前,指物宾语只能在后。另一种方式是动词重复,分别带指物的宾语(即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例如“畀樽汽水畀佢”(给他一瓶汽水)。客家话也有类似情况,如“分本书佢”、“分佢一本书”、“分本本书分佢”(他欠我十斤米)。但有些动词后面的指人宾语只能在前,指物宾语只能在后,如“佢欠佢十斤米”不能说成“佢欠十斤米佢”(他欠我十斤米)。鉴别特定语料时,可以根据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双宾语的不同位置来鉴别。如果碰到双宾语的位置基本相同时,则可以从充当谓语的动词和人称代词的不同来鉴别。例如,粤、客方言都有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的现象,但从上列的例句中可以看出,广州话充当谓语的动词是“比”、客家话是“分”、普通话是“给”,广州话的第三人称是“佢”,客家话的第一人称是“佢”。

3.4 从各方言中句子结构的不同特点来鉴别

汉语各方言间的主要句式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比较句、被动句、处置句、“来”“去”句、疑问句等句式上则各具特色。例如,在比较句方面:广州话、潮州话、海南话有“甲+形容词+过+乙”的句式,如广州话的“细佬叻过大佬”(弟弟比哥哥能干),潮州话、海南话的“你矮过我”(你比我矮);厦门话有“甲+较+形容词+乙”的句式,如“厦门较细广州”(厦门比广州小);客家话有“甲+比+乙+过+形容词”的句式,如“今年嘅产量比旧年过高”(今年的产量比去年高)。在被动句

方面:普通话与各方言或者方言与方言之间被动句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用来表示被动句的词的不同或句子结构上的不同。前者如普通话的被动句通过介词“被”或“给”来表示,在口语中还有用“叫”、“让”等来表示;而广州话用“比”来表示,如“伯爷公比滚水澆亲”(老头子被开水烫了);客家话用“分”来表示,如“老鼠分猫公咬呀死”(老鼠被猫咬死了)。普通话被动句中的介词“被”后不一定引出主动者,而客家话则需引出主动者。例如客家话的“镬头分佢打烂□[ne¹¹]”不能说成“镬头分打烂□[ne¹¹]”;潮州话的“鼎乞伊拍破了”不能说成“鼎乞拍破了”。在处置句方面:方言与普通话或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介词的使用或句子的结构上,普通话的处置句是通过介词“把”把宾语提前,表示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的处置,而粤、客方言则多用“将”。在“来”“去”句方面:方言与普通话或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充当谓语的词和句子结构不一样,例如:普通话采用“上(到)……去”或“上……来”等词和“主语+‘上’”或“‘到’+宾语+‘去’或‘来’”的结构形式,如“我上(到)你家去”、“老张今天到我们学校来”;而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通常用“去”或“来”等词和“主语+‘去’或‘来’+宾语”的结构形式,如“王师傅去工厂”、“李同志来广州”。此外,在客家话、潮州话和厦门话中,还有一种“来去”代替“去”的句子,如“偈(我)来去食饭”(我去吃饭)。在疑问句方面:不少方言在运用肯定否定的方式来表示疑问的句式方面各有特色。例如,广州话在运用肯定否定的方式来表示疑问时,有一种把宾语提前到肯定词与否定词中间去的句式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如“你去打波唔去”(你去不去打球)。

除上述各种句式各具特色外,有些方言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鉴别特定语料时,可根据语料中反映出来的句式上各式各样的特点来进行鉴别。在句式相同或相近似的情况下,则要参照句中方言词语的特征和其他方面的语法、语音、词汇特点进行分析。

3.5 从各种词类的特点来鉴别

各种词类在不同方言中各有自己的特色,这是鉴别特定语料极为重要的材料。

3.5.1 根据表示动词“体”的不同类型、方式和句子结构来鉴别

不少方言的动词都有表示“体”的语法范畴。但表示“体”的类型、方式和句子结构则各有不同。例如,粤方言动词“体”的语法范畴特别丰富,其中有“开始体”、“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经历体”、“回复体”和“短时体”。如果动词后加助词“起上嚟”则表示“开始体”,如“两个人吵起上嚟”(两个人吵起来)。如果动词后加助词“紧”或“开”则表示“进行体”,如“佢哋睇紧(开)电视”(他们正在看电视,他们看着电视)。如果动词后加助词“咗”或“亲”则表示“完成体”,如“佢嚟咗”(他来了)、“细路女比刀仔刮亲”(小女孩给小刀儿刮了)。此外,还可以通过动词变调的方式来表示“完成体”,如“佢去嚟”中的“去”念原调(阴去)则表示动作未完成,如念高升变调则表示动作已完成。如果动词后加助词“过”则表示“经历体”,如“我学过法文”(我学过法文)。如果动词后加助词“翻”则表示“回复体”,如“佢做翻佢嘅嘢”(他做回他原来的工作)。如果重叠动词中间加个“一”则表示“短时体”,如“睇一睇”、“摸一摸”即表示动作短暂。粤方言动词“体”主要靠动词后加助词或变调或重叠动词并中间嵌字来表示。上述各种“体”中,普通话一般只有“进行体”和“完成体”。普通话表示“进行体”和“持续体”没有什么区别,只用在动词后加“着”来表示。同样表示进行体,粤方言用动词后加助词“紧”或“开”的方式来表示,普通话则用动词后加“着”的方式来表示。从特定语料中表现出来的有关动词体的不同方式、类型、句子结构等特征来鉴别语料制作人操何种方言(次方言、土语)、属何地区人也是极为有效的。

3.5.2 根据指示代词的不同特点来鉴别

表示“近指”和“远指”的指示代词,不少方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普通话的近指代词用“这”、远指代词用“那”。客家话指示代词用来指人、事物、处所、时间、数量时分近指,如“唔系欵(里)只”(不是这个);中指,如“唔系□[ke⁵²]或[kai¹¹]只”(不是那个);远指,如“也唔系□[ke⁵²]或[kai⁵²]只”(也不是那/那个)三类。但是,普通话表示近指的代词“这样”和表示远